

100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交通科站承担邮政局角色

——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发展掠影(上)

□ 文/图 本报记者 曹永亮

晋绥邮工歌谣一:(革命岗位)

“爬大沟,过碉堡,交通员们胆量高,是天地,是地角,敌人封锁做不到。到如今,扩大了,邮政工作更重要,办包裹,开汇票,革命岗位要站牢。”

晋绥邮工歌谣二:(邮工跑夜口歌)

“夜深天黑无星星,街上点了一盏灯。你一拉,我一扯,驮子绑得稳又稳。百十多斤的书报信,扛上驴背奔前程。”

以上两段歌谣反映的是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成立后,邮工工作的场景和经历:信件包裹传递,条件好的可以配上驴骡,条件差的只能靠人肩。上百里的路程往返要走三

天。还要面临饥饿以及战争等潜在的危險。相比之下,现代邮政事业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,更具现代化。长途运输包裹信件可以通过飞机、汽车等交通工具,邮递员可以选择汽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派送信件。

作为陕甘宁边区通往晋察冀、晋冀鲁豫、山东、华中和华南的门户,双向交换邮件、护送干部的枢纽地区,晋绥边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由于它也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屏障,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,因而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、畅通成为晋绥边区交通邮政建设的中心任务。

1946年3月1日,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由晋绥边区交

通总站和边区境内的临县、兴县、河曲等4个县级中华邮政局以及一些代办机构合并组成,办公地点位于兴县城东门街。到1948年,晋绥边区发展邮路里程达11800余公里,与各边区通信联络更为方便与紧密,为促进人民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除此之外,团结“中华邮政”人员,使得他们顺利参加边区邮政工作,促进边区邮政事业正规化,也折射出我党领导人卓越的思想;边区邮政局成立后,为西北、西南等地培养了一大批邮政骨干人员,为区内外的邮电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。

转递公文和报刊为主业

时下,一部反映抗战题材的情景喜剧《地下交通站》颇受电视观众的喜欢。该剧充分展现了我党在日战区、国统区等创建地下交通站、秘密交通线的艰难,交通员在完成传递党内文件、命令任务时面临的风险与困难。

抗战初期,我党长期处于不公开状态,有事单线联系。凡属党内文件、信件都是派党员传递,最重要的由区、县委亲自传达。交通站就扮演了这一角色,战时负责传递情报、信件、宣传品,以及接送过往人员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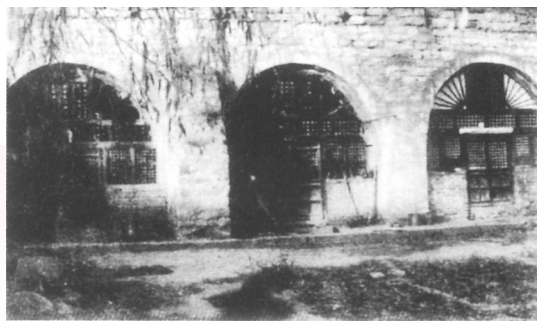
1938年秋,中共晋西南区委和晋西北区委分别成立了交通科、发行科。交通科负责当时机密文件的传递,发行科主管报刊的发行。1940年,新政权建立之初,边区的交通工作尚未统一建立,党政军民各系统均自设通讯队,按级分别去送公文。1941年3月,边区成立晋西通讯总站,各分区社中心站,县设小站,受各级党委领导,交通工作开始初步统一。同年5月,又改为交通局,边区设总局,各分区各县设交通分局与交通支局,受各级政府和党委领导。业务主要是投送报纸与传递公文,重要公文尚有挂号手续,间有群众信件亦代为投递。

1942年1月,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《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》,以保障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和干部能迅速而安全地互相传递。遵照这一指示精神,晋绥边区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,建立了通往华北、华中、华东各区的3条秘密交通线。

1942年精兵简政后,交通局再次被改为交通站,机构紧缩,与新华书店合并,兼办党报与书籍刊物的发行,边区设总站,分区、县设分站与县站,区村交通发行由党委或政府人员兼办。区级以上均由专设的交通员取走,区级以下的行政村不设脱产交通员,有些事是顺人捎送,个别地区是由县交通负责送到行政村。挂号制度亦取消,重要公文改由编号登记办法转,这种交通站的组织一直持续到1945年年底。



中共晋西北交通科旧照。



中共晋西区委交通科遗址(兴县北坡村)

早在1929年,蒋介石对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第三次“围剿”之时,时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、政治委员毛泽东对“中华邮政”就发出“保护邮局,照常转递”的指示。1937年,抗战爆发,日本侵略者占领太原后,山西省邮政局迁至西安,成立晋陕军邮总局。在晋察冀边区设立“第六军邮分段”,负责人冯玉松、军邮员为胡儒生等人。国民党西安当局为阻挠国共两区正常通邮,百般刁难,对设在边区国民党的军邮人员,不按时发工资和提供给养。为争取这部分人员团结抗日,他们的工作经费等完全由抗日民主政府解决。1940年,晋陕军邮总局视察林卓午受到周恩来接见,商谈国共两区通邮问题,周恩来为其题词:“传递万里,国脉所系。”

1942年1月中央书记处曾发布指示,要求各地政府对“中华邮政”员工之人权、财权、地权、言论、结社等给予保障,并且对他们在生活上、行动上、工作上处处给予协助。期间还增派干部到中华邮政局工作,成立邮工合作社,解决了邮工的思想问题。

1945年,国共双方签订《双十协定》后,国民党撕下“表面和

实现“交邮合一”

谈、积极备战”的面孔,边区的“中华邮政”人员也面临抉择。此时,姚振声请示边区领导,同意动员边区的“中华邮政”人员脱离国民党军邮系统,参加解放区,建立新的人民邮政。在做通时任边区“中华邮政”军邮视察员胡儒生的工作后,由胡儒生执笔,写出了脱离“中华邮政”,参加解放区邮政工作的通电。

1946年2月晋绥边区行署召开了“交邮合一”会议,决定将边区交通总站与边区境内残留的四个国民党中华邮政局(设在兴县、临县、河曲、碛口,共员工35人)合并,组成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,实行正规邮政制度。3月1日,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正式成立,姚振声任第一任局长,胡儒生为副局长。

参考文献:1、刘铭彝《晋绥边区邮票研究》
2、《中国邮票史》第6卷
3、《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》
4、《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》山西经济出版社
5、《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》山西人民出版社
6、《兴县革命遗址综览》兴县档案史志馆编



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遗址(兴县城区)



吕梁故事